

“后危机时代的欧洲一体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姜 姝

2013年7月13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后危机时代的欧洲一体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山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波兰华沙经济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利时欧洲学院、澳门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欧洲中心/欧盟中心主任杨慧林教授,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周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参事时殷弘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欧洲中心/欧盟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让·莫内终身教授宋新宁主持,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欧债危机对欧洲政治的影响”、“欧债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和“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的影

响”等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果的交流。

一 欧债危机与欧洲政治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比斯科普(Sven Biscop)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分析了危机时代的欧洲外交政策,认为欧盟外交政策的国际战略地位取决于其对地区和国际的影响力,以及成员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一致对外。欧盟国家致力于外交协调和趋同,已取得了进展。欧洲外交政策和欧洲安全战略是欧盟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有效工具。

对于欧债危机的政治后果,荷兰莱顿大学的格里菲斯(Richard Griffiths)教授指出,欧债危机逐渐演变成了欧盟危机,并酿成了合法性的危机,为此需要重构欧元和巩固民主。从目前看,欧盟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这主要源于欧盟内部各主权国之间权力的严重不平衡。主导欧盟的是德法等大国,它们在各种事务上相互牵制明争暗斗,其余的西南欧诸国拥有的话语权十分有限,特别是后来加入的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部更是力量单薄。在这样的权力架构下,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没有统一的权威力量,在重大事务上各国囿于本国利

益,往往难以做出有利于全局的决策,特别是欧盟本身复杂的民主决策机制和各国内部各利益团体的压力都使欧盟运作效率下降。这种松散的联盟模式对于推进市场一体化、财政政策协调与财经纪律的执行都非常不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着重分析了欧债危机的政治因素,他指出,欧盟的决策机制不利于采取果断而快速的行动。应对债务危机需要果断而有力的政策行为,但在欧盟的制度安排中,有些政策行为需要得到每一个成员国的同意,为此进行的磋商和博弈极为艰难。所幸欧盟国家领导人已表达了强大的政治决心,即利用应对债务危机的契机,进一步推动一体化。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面临着不利和有利的政治因素。这意味着危机在近期内难以得到彻底的解决,但不会导致欧元解体。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义桅教授认为,欧洲一体化需要新的文明引擎,他从一体化、国内政治和外部关系三个方面综合评价了危机中的欧洲现代文明。他认为欧盟是欧洲文明的伟大成果,但是应对危机还需要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等方面作出积极改变。“笨猪五国”(PIIGS)历史悠久,但“先发劣势”作祟导致如今的困境。先进的生产方式带来先进的生活方式,但当全球生产方式大调整后,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就不再那么先进,反而拖累了经济发展。一体化曾经是欧洲最大的比较优势,在新兴国家参与开放式全球化竞争的情形下,反而成为欧盟的先发劣势。同时,欧盟和美国一样,自始至终遭遇合法性困境。然而,欧盟作为继美国之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的创新,并未穷尽制度选择工具,且具有雄厚的社会实力、人文财富,完全有能

力走出上述困境。

二 欧债危机与欧洲经济

丹麦奥尔堡大学的普拉斯科(Henrik Plaschke)教授认为,造成欧元困局的主要原因是相互独立且相互竞争的主权国家使用了无锚的“超主权货币”,一旦受到冲击,各主权国家在危机应对上各自为政,维护本国利益。此外,欧元区外围国家的过度举债和核心国家的有借必应也是问题的根源,欧洲货币联盟的制度缺陷也为成员国之间的过度信贷开了方便之门。但是,欧元是各成员国共同利益之所在。虽然欧元区成员国在如何摆脱危机的措施上存有种种分歧,但在维护欧元的存在、保持欧元区统一方面是一致的。

波兰华沙经济大学的海杜克(Gunter Heiduk)教授认为,此次危机让欧元区内的某些矛盾和冲突浮出水面,同时也让迟早会面对的困难和问题提前到来。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主权债务危机,希腊等国的问题不是因为欧元的诞生而引发的,同时欧元区内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也不是欧元造成的,而是长期以来高工资、低储蓄、高赤字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没有了欧元,这些问题可能会更严重。欧元的存在,使欧元区诸国成为利益共同体,这有助于解决共同的困难,也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均衡发展。围绕欧元区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严格的财政约束机制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等方面的改革,会随着危机的逐步解决而提上日程。欧元区内的经济整合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建立新的权利与责任相对称的财政自我约束机制,将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同时为了共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欧盟内部大国博弈将逐步让位于整体利益和全球外交,上述种

种努力将进一步推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经济研究室主任陈新教授认为,欧洲个别国家的债务问题最终演变成甚嚣尘上的欧债危机,除了希腊等欧债国家自身的缺陷之外,一是因为欧洲经济治理的弱点,二是由于欧洲对金融监管的缺失。因此,这次欧债危机推动了欧洲在这两个领域的进步。欧洲经济一体化需要解决宏观经济不平衡问题,主要包括经济治理、紧缩政策、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市场改革。危机往往也是转机。这次欧元危机必将推动欧元区深化体制、机制和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在货币联盟基础上,创建统筹货币、财政、预算和税收的制度和机制。从长期层面来看,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经济竞争力,带动经济增长。

三 欧债危机与中欧关系

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古斯塔夫·盖拉茨(Gustaaf Geeraerts)教授认为,中欧关系在实质上是战略性的,双方需要进一步增强互信和互利互惠。欧盟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利益的地区力量,正在有秩序地转型以应对“多层极化”的世界,推进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在经济上,中欧呈现出强烈的互补性,能够降低贸易不平衡,推进互利合作。未来欧中双边贸易要继续保持如同上一个10年那样的繁荣,欧中双方都需要寻求一个共同战略,有效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以打消彼此的疑虑。

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在发言中展望了中欧之间的战略竞争前景。他认为,均势政治的存在逐渐有利于中国,进而有利于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欧债危机加剧了中欧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中

欧关系有望获得更平等的发展基础。

比利时欧洲学院的门镜教授分析了当前中欧关系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包括政治上的军售禁令、经济危机、贸易摩擦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分歧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相对崛起和欧洲的相对衰落、中国的决策重心偏向美国和欧盟难以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为此,中欧对话制度安排的强化十分必要。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冯仲平教授指出,欧债危机突显了中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欧洲一直对中国援助其危机应对抱有期待,包括欢迎中国投资、希望中国扩大从欧洲的进口等,而中国希望借此机会加强全球治理,成为国际体系中真正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说,欧债危机拉近了中欧关系,不论是债务国还是援助国,不论是欧盟老成员还是新成员,都希望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

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院长、让·莫内讲席教授陈志敏对中国与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关系水平进行了测量。他认为,中国和欧盟之间存在着双层关系:中国和欧盟机构的关系,中国和各个欧盟成员国的关系。欧债危机后,欧盟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再国家化”的现象,中国和欧盟各成员国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为此,陈志敏教授提出了改善双方关系的政策建议。

会上,专家学者还就欧盟对外贸易问题、欧盟的经济安全和金融监管、全球治理和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改革、欧洲一体化中的德国问题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作者简介:姜姝,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莫伟)